

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

服装是民族文化没有争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似乎是服装文化史、民俗学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基本见解，同时，也是一般社会公众的常识性认知。但中国民族学对于“民族服装”或服饰文化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国内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研究上，相比较而言，对于汉族的“民族服装”，对于中国各地方丰富的“民俗服饰”，进而对于“中国人”（国民）的“民族服饰”问题却较少涉及

[2]。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问题的若干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民俗服装与民族服装：象征性与意识形态

分别对应于汉语文中“民俗”与“民族”概念的用例，本文拟提出“民俗服装”与“民族服装”这样两个概念 [3]。所谓“民俗服装”，主要是指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乡土地域社会中，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和民俗文化传统均密切相关的民间服装。中国各地的民俗服装，大体上都是在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半农半牧社会等背景下形成的。从棉花（实际上还应包括葛、麻、蚕丝等）的种植、采摘，到纺纱、织布（粗布、土布、老布等），再到印染（蜡染、扎染等）、裁缝（女工），民俗服装乃是“男耕女织”之社会分工结构的产物。民俗服装以手工缝制为主要特点 [4]，就此而论，它和纺织工厂大批量制造的成衣绝然不同。民俗服装具有颇为稳定的超越世代的传承性，其款式、纹样和裁缝手工艺或技法等，往往可长期保持不变或较少变化，就此而论，它又和现代都市社会里变化多端的时装有明显的区别。下面拟以陕西地区的情形为例，对民俗服装再作大致的说明 [5]。

陕西男子的春秋季服装，主要有用土布、白市布和浅蓝色条格布等制成的衬衫与便服。衬衫为圆领，领高 1 寸左右，对襟，连袖或接袖，袖长过前襟，垂手处有紧袖口、开袖口和半截袖几种款式。便服款式略同衬衫，尺寸稍大，布料多为斜纹布、毛呢和哗叽等，其实也就是稍微简易的“中山服”，或称“四个兜”。陕南、陕北山区则有大襟长衫，套在贴身衬衫之上，长度遮住臀部直至膝上，腰间可系带；大裳，类似古代“深衣”，民间称“大氅”，均正开长襟；带腰裤，俗称“大裆裤”，颇受农民欢迎。此外，民间还多穿开腰式裤，亦即所谓西裤，俗称“插手裤”。男子夏季服装，主要有背心，俗称“汗夹”；正开襟的衫子；带袖汗夹以

及单薄凉爽的夏用裤子等。男子冬季服装，主要有中式棉袄，对襟，紧领口，一般再外罩护衫。除此之外，还有棉背心、棉大衣、棉裤等。

陕西妇女的春秋季节服装，上衣多为红布衫、月白衫、葱白的确良衫、花格呢衫等。贴身穿的称为内衬、衬衫，外面穿的称罩衫。衫子均圆领，正开襟。陕北中老年妇女喜欢穿着一一种圆领大襟衫子。裤子有单、夹之分，除中式传统的带腰裤，还有直筒西式女裤。妇女的夏季服装，主要有花格布衫子或夏布衫子，经济条件好的则穿尼龙、涤丝或丝绸面料的衫子等。老年妇女多为深色夹衫，农村至今依然有妇女穿传统的斜大襟衫子。妇女一般不穿裙装，而多为夏布或市布裤子。妇女冬季服装，主要有中式传统的大襟棉袄、西式女棉袄，此外，女性还多穿毛衣、羊毛衫等。棉裤与秋季裤子的样式基本相同，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式直筒棉裤（带腰）。乡下妇女裹衣，多为红色肚兜。

从以上简述来看，陕西地区的服装民俗除了已经受到中山装、列宁装和西式衣裤的一些影响之外，确实保存着很多地方性传承的特征，诸如圆领对襟的衬衫、棉衣和棉裤、大裆裤、大襟长衫、肚兜等。它们作为民俗服装的重要特点，便是和当地的气候、风土及传统习惯密切相关，往往还具有一些独特的穿着习俗。例如，以关中地区来说，顺口溜有“旧衣罩在新衣外”（保护新衣，不露富）、“穿厚棉裤敞开怀”（春秋季节，适应早、中、晚温差的方法）、“大裆裤子没裤带”（挽系）、“棉裤棉袄光里外”（以前的农民较少穿衬衣和内裤）、“四季一身黑穿戴”（衣服色调较为单一）、“短衣套在长衣外”（马甲与坎肩）、“反穿皮袄毛朝外”（耐脏、保暖）、“衣服上下没口袋”（旧时的对襟褂子和大裆裤均无口袋，钱物一般在贴身的肚兜或头顶帕帕里夹带）、“裹兜老少四季戴”（又叫“肚兜”、“麻头”，功能有暖胃、防止着凉、遮羞、护身符和贴身夹带东西等）、“皮袄不穿披起来”（夸示）[\[6\]](#)等等。此外，还有“二八月，乱穿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等很多谚语，它们都充分地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智慧和起居常识，是其民俗文化的重要侧面之一。例如，“男女帕帕头上戴”一句，是说关中农民喜欢头顶一块黑色或白色手帕（方言称“帕帕”），陕北农民的形象也是身着对襟夹袄，头顶白羊肚毛巾。这主要是因为黄土地带灰尘较大，手帕可以挡风、遮尘、擦汗，顶或戴在头上很是方便。

中国幅员辽阔，类似陕西这样具有地域性的民俗服装，其实还可举出很多实例。像客家人的服装，老年妇女多穿青布宽大衣衫，上衣为大襟、右扣；中年妇女则喜欢穿碎花偏素、上下同色，尺寸略紧的衣衫以便于劳作[\[7\]](#)。闽台一带由于四季如春，以薄袄轻衣即可过冬，故较少棉袄、棉裤；一般士女均着便于劳作的“衫裤”，男衫对襟，女衫为侧开襟，即所谓“大面襟衫”；男女裤子均为宽肥的大裆裤，裤头多接白布[\[8\]](#)。贵州的汉人支系屯堡人的妇女装束，多为青色或蓝色大襟长袍，腰缠布或丝质长腰带，并在衣襟、袖口等处镶以花边[\[9\]](#)。福建惠安女的装束，民间则向有“封建头（头巾遮挡）、解放脚（基本上打赤脚）、经济衫（上衣短窄、甚至露出肚脐）、浪费裤（裤子肥大、宽松）”等形象的说法。可见，汉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民系的服饰，在多少具有一些共性特点的同时，也每每有所差异，不少地区均有很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

服饰，诸如客家人的凤冠、福寿帽（童帽）和木屐，四川的缠头白帕与女性围腰，陕西、山西和山东的肚兜、虎头帽，上海的兜头手巾、老布作裙（围裙）与叠裤[10]，还有“红裙”、“披风”[11]等，江苏吴江妇女的襖裙、穿腰以及“拼接”、“滚边”等缝纫技法[12]，山东渔民补丁密布的“风衣”和旨在保护孩子安康的“百家衣”[13]等等，不胜枚举。

本文所讨论的“民族服装”，主要是指在多民族的族际社会中，能够作为民族识别或归属之标识的服装。在中国，此概念还常被用来特指少数民族的服装[14]。上述对于民俗服装的若干分析，大都能适用于此处所谓的民族服装，例如说，民族服装也与其具体的自然环境、生计方式和文化历史的传统密切相关等。但是，民俗服装一般多不具有族际标识的功能。由于陕西地区较少其他民族分布，因此，通常也就不用特别强调它其实也就是陕西汉族的服装，而只有当它与其他民族（如回族）形成对比或将其与西式服装文化进行比较时，它才会显现出其作为汉族服装或作为中式服装的属性，也才有可能发挥出某种程度的族际标识和认同的功能。当我们把它和其他地区的民俗服装进行比较时，一般我们会说它们分别反映了汉人服饰民俗的地域多样性特点。

显然，在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和不可逾越的鸿沟。“民族”往往具有多层次的结构，其内部常有支系、次级集团（例如，地域集团、方言集团或某些血缘支脉等）或更为基层的族群，而其服饰民俗也每每会有所不同。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服饰也有可能作为次级民族集团的认同标识。这方面的例子，或许以贵州苗族的服装文化最具有典型性[15]。

据统计，贵州省境内约有苗族服饰 100 多种，身着不同款式苗装的人们往往可能属于不同的方言社区或支系。贵州苗族妇女服装的传统款式有两个大类，一是大领或大襟衣配百褶裙，二是大襟衣配长裤。再具体细分，据说又有若干类型（黔东南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黔东北型等）和为数众多的“式”（在每个类型下都包括若干式，例如，黔东南型里有台江式、雷公山式、丹寨式等）。为节省篇幅，我们不用去描述每种苗族服装的形态学特点及其彼此的区别了，这里只需指出的是，苗族服装是在贵州整体的族际环境之中，亦即是在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相互对比中才凸现其民族服装之属性的。若是没有族际的场景和条件，就可将它们只理解为民俗服装。换言之，民族服装乃是在族际环境下由民俗服装延伸而来。至于支系层面的各式服装，一方面，它们既具有反映其地域性特点的民俗服装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在某些族际条件下作为民族服装的资格。

并非所有的民俗服装均能在族际背景下成为民族服装，这要取决于族际关系的各种具体的情形。族际场景通常总会选择一部分民俗服装而不是全部来作为民族服装的典型，显然，民族服装是在族际环境下被定义的，这就如同民族的“自称”和“他称”一样，既需要自称的依据，又需要有他称的承认。民族服装也是既需要有民俗服装的依据和根源，又需要有族际环境的筛选。例如，在中国的大多数场合下，节日盛装要远比日常着装更容易被选择作为民族服装或其改良的原型。

少数民族服装在中国多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典型性。由于琳琅满目的服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观赏性，少数民族的服装也就很自然地经常被演绎出许多特定的意义。例如，在很多国家仪式的场合，少数民族的代表身着民族服装已成为一种惯例（人大和政协会议等）。几十年来，少数民族社会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致力于改良、创制和界定着各自的民族服装，以及通过民族服装而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展示着各自的“民族形象”，此乃寻常可见的文化动向。例如，少数民族服装的“舞台化”倾向，大体上就可以在如此的文脉中获得一定的理解。但有些时候，舞台化的“民族服装”，既可能制造出、也可能迎合于周围其他民族有关某一民族的认知或印象。在中国多民族社会的族际关系里，除了民族服装的自我展示和相互界定之外，服装文化的族际交流也是寻常可见的，例如，几乎在所有少数民族社会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日常男装和汉族服装及都市时装逐渐趋同的发展走向。

无论民俗服装，还是民族服装，在其作为所属社会之生活文化的意义上，它们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都在具备保护人类身体之衣服自然属性的同时，还具有通过服装表现某些象征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社会属性^[16]。例如，它们都和其社会的人生礼俗、伦常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也都经常地被用于作为各种社会与文化场合的象征物^[17]。一般来说，服装的物理实用功能和审美、表现与象征性的功能是同时并存的。越是在无法保证温饱的社会或时代里，服装的物理实用功能（挡风遮雨、避寒、护体、遮羞等）也就显得越为突出；而越是在经济富足和社会生活自由化的社会或时代里，服装的表现、审美和象征性功能（例如，夸示、职业和身份等级的标志、族群认同、个性张扬等）也就越发会得到膨胀，以至于在现当代的时装社会里，服装的自然属性甚至有可能被其社会属性所彻底屏蔽。换言之，服装的进化历程，多少具有物理实用之功能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而其象征、审美和表现功能的重要性逐渐增强的倾向。民俗服装一般较少发挥族际标识的作用，其物理功能和自然属性在社区或其地域之内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同时，在社区或地域社会的民俗生活中，它也一样可以发挥审美、象征和表现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功能。例如，日常服装、劳作服装和节日盛装的区分与组合，性别、年龄、职业以及不同人生状态（婚否等）的标示等等。比起民俗服装来，民族服装由于需要在族际社会里展示民族的形象，故其物理或自然属性便不再那么重要了，与此相应的则是其象征性往往会有突出的扩张。

和少数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度里经常需要展示各自的民族服装颇为相似，在国际社会的场景下，也就自然会出现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在与西方或东洋的服装文化相对比时，明确中国或中式服装的一系列文化特点或其历史传统的特点，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在现代社会里，人们身着民族服装的场景和机会并不特别多，但民族服装依然是备受海内外关注的问题。

中国自称“衣冠王国”。甚至早从先秦时起，汉人的服装形制就已初步形成了两个谱系，一是上衣下裳（或裤），大襟、右衽；二是“深衣”，亦即所谓袍服。由于袍服不大方便于劳作，故较多为上层阶级采用，下层民众则多采用上袄下裤。但无论哪种形制，中国古代的服装基本上都是平面裁剪，多为连袖（无肩缝），

不大倾向于强调人的身体与性别特征，而是以宽松、平直、随和以及遮掩人体为基本特征的。大约到了清代，中国传统服装的大部分基本元素和各种传统技法便基本上趋于成熟，并成为后世人们进行服装改良和服装创新的主要文化资源和基础。

在讨论中国服装史问题时，应该指出中国文明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就是建立有严密的所谓“服制”，亦即服饰制度。中国古代的服装制度，乃是其政治秩序、社会等级和身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通过服制规范官员与人民的行为，任何人不得僭越。历代帝王为政，均非常看重“服色”，每逢王朝更迭，总会有“改朔易服”之类的举措，因为服制与服色不仅可被用来象征天命（如龙袍），还可以表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和身份、地位等[18]（如“补子”）。《易经·系辞》里所说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乾坤”，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服装在中国不仅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它往往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符号，其中蕴含着很多的象征性和意识形态背景。正因为如此，在民俗学看来，服装往往有可能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载体[19]。不过，服装的象征性意义也与其时代的诠释有极大关系。例如，很多年以后，海内外对中山服的印象是“保守”，而“西装”似乎就意味着“开放”，殊不知中山装当年曾是颇为激进的一种“革命”服装。显然，要想真正地理解中山装，还必须首先从中国服装的近现代史背景去入手，方才可能。

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衰败、被侵略、内战和革命的混乱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晚清时代中国人的装束——亦即男子以长袍短褂和发辫等为其典型形象，女性则多为“旗装”或以“偏襟大衫”、裹脚等为其典型形象——被认为“保守”、“落后”、死气沉沉和具有封建意识而逐渐被国人放弃。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着装服饰等，在剧烈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出现了改良、创新和基本上是以“西装化”为导向的发展趋势。然而，全面、彻底的西装化并没能得到顺利的实现，值得注意的却是先后出现的很多次涉及“民族服装”的创制、“发明”乃至重新建构的尝试。在所有这些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当中，以中山装和旗袍的创制与流行最为典型，而不久前刚刚出现的新唐装的隆重推出，则似乎说明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即便是到了 21 世纪的初叶，依然尚未完成其最终的目标。

中山装：孙文的成功和毛泽东的继承

中山装原本并非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其历史也并不很长。但是，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却把原本具有西式来源的中山装解读为自己的“民族服装”，这其间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关于中山装的原型与由来，诸说不一，尚无定论[20]。不过，对于中山装之和孙文其人的特殊关系、中山装与海外华侨的密切关系、中山装与西式服装文化的密切关联、中山装所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属性等等，则是为大多数研究者们所共同承认的。但在分析有关中山装的问题时，我们既应承认孙文个人的巨大贡献，也必须看到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服装生活变迁的时代大趋势及其深厚广大的社会基础。

早在中山装被推出和其普及之前，中国人在服装生活方面的变革便已有诸多迹象可寻了。在晚清掀起的海外留学热潮中，在海外华侨社群中以及在沿海各通商口岸的城市里，“洋装”逐渐出现并为人们所广泛关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很多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均采取了反清崇洋的立场，他们留学欧美、日本归来后纷纷剪去辫子，脱下长袍马褂，蓄起“西发”，穿起了“西装”。换言之，历史发展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服装生活的革新巨变业已揭开了序幕，并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当时，还曾一度出现过长袍马褂和洋装相互混杂的局面，诸如在长衫外罩以西装之类的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是要在改朝换代时更改年号和服制等。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政府的急务之一，也是要尽快改变国人长期以来被西方列强目为“羸弱”和“病态”的印象，亦即通过“剪辫”、“放足”、“易服”、“咸与维新”，来逐渐树立起中国人的新形象。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经颁布了许多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其中有关“剪辫”、“易服”等方面的内容尤其值得关注。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看来，剪辫旨在“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21\]](#)，可在令到之日20天以内实现，但“易服”的原则是“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可见，服装改革的问题确实是更为复杂一些。这是因为服装不仅涉及到民族标识等重要的象征性，它同时还涉及到国计民生与民众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例如，从国家的纺织与服装工业的水平，到各个地域普遍存在的“民俗服装”以及各种不同职业与性别的服装；从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到人生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等等。此外，社会生活的诸多具体场合或场景，也都往往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服装去表现或展现。故当时所谓“易服”其实主要只是就礼服而言的。民国政府于1912年10月，颁布了男女礼服，分别有中、西式和昼礼服、晚礼服等[\[22\]](#)，也正是体现了服装改革的这种精神与特点。

孙中山本人大约是在1895年年底前后在日本的横浜剪辫、易服，穿上了西装和日本当时的新式服装如学生装、士官服等，以表示与清朝决裂和崇尚新文化的革命决心。孙文最初的易服行为，在他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逐渐地发展出一种有关“民族服装”的思想，进而还进一步发展为具体地创制、示范、提倡和积极推广中山装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孙中山认为，穿衣是随文明进化发展的，故文明越进步，穿衣问题也就越复杂；服饰应该既护体，又美观，还必须方便，不碍于劳作。他和当时很多革命党人认为，长袍马褂不适宜于现代生活，且剪裁费料，不经济。在他们看来，对襟式短衫有失简陋；大襟式长衫则行动不便。换言之，传统的中式服装被认为既不实用，也不合时宜。西装在当时的中国虽流行一时，但它除了上衣，还需配合衬衣、领带、皮鞋、手套和礼帽等，不仅较为繁琐、费事，且价格昂贵，多需进口，故亦不大适合当时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为爱国者的孙中山，甚至计算了进口洋布和西装而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因此，发展民族工业，提倡国货，以解决国人穿衣问题，便构成了其创制中山装的基本动机[\[23\]](#)。

孙中山理想的民族服装，实际上就是使西服中国化，同时还应“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也就是他希望有一种既能反映国人新的精神风貌，又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服装式样。中山装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经由孙文参与创制的中山装，兼具中、西服装之长，被认为是中西服装文

化结合的产物。中山装的推出和逐渐普及，被很多研究者看作是中国服装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有人说它使中国人较为彻底地告别了几千年的袍服传统；也有人指出，中山装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国人对“民族服装”的渴望。可以说，在民国时代服装平民化、大众化、都市化及西方化的发展趋势中[24]，中山装所发挥的前导作用尤其不应该被忽视。

中山装的款式原型基本上是外来的，它以西式服装（无论其原型模仿自英国还是日本）为样本，汲取了西式服装剪裁的不少技术。早期的中山装以单立领、领子紧扣（关闭式的中山装立领和开放式的西装翻领，可形成鲜明对比）、对襟、装袖、暗兜或四明兜、后背破缝、直线排列七、六或五扣为等特点。同样参照西裤样本设计的中山装裤子，把传统的连裆裤改为前后两片组合，其特点是前面开缝用暗扣，左右侧设暗兜，左右臀部或各挖一暗兜，裤腰打褶，裤管翻脚等。在后来的发展中，中山装也不断得以改进和简化，如立领改为翻领（亦称“翻折式立领”），使其更显硬挺、精神；破缝、袖扣等逐渐消失。中山装将一般西式服装的3个暗袋改为4个对称明兜，颇符合国人的均衡审美观。中山装虽然取法于西式服装，基本上可划归西式服装的谱系，但其款式与欧美的西服却也明显不同，其中多少汲取了传统中式服装的一些要素，如对襟和某些传统的缝纫技艺等。中山装的造型也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式服装的平面与连袖剪裁，它通过装袖、垫肩、适当收腰等技法，在总体上达到了贴合人体而又端庄持重、简朴大方、严谨干练，有阳刚之美的穿着效果。此外，中山装的缝制工艺也较西装简易；既可使用高级衣料制作，也可使用一般布料制作；既可作礼服，也可作为日常衣服，适用于很多场合，被认为具有实用、方便和经济等优点。

中山装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性，亦即在西装基本样式上渗入了中国的传统意识和革命意识形态[25]。据说孙文把早期的七纽扣改为五纽扣时，就是要象征“五权宪法”[26]（一说象征“五族共和”）；中山装的四明兜，标志着“礼、义、廉、耻”四大美德（《管子·牧民》所谓“四维”）；兜盖呈倒山形笔架式，象征革命要重用笔杆子(知识分子)；明兜的四粒纽扣蕴含人民拥有“四权”之意[27]；衣领的颈部紧收，被认为是应对压力与危机的象征。有的裁缝师傅还认为，中山装袖口的三个边扣代表三民主义，而四只加盖的明兜则代表四海归心等等。由于中山装是基于孙文及其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而人为创制的，故蕴含着创制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其象征性的特点也就显得尤为突出。

孙中山早年曾穿着过中式礼服、西服和日本学生制服等，但他晚年却主要只穿中山装。在孙文个人魅力的影响下，同时也受革命党人的响应及民国政府的推行影响，中山装迅速风靡全国。1929年，民国政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将中山装规定为党政官员的礼服。当时的《宪法》也有规定，官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着中山装；春、秋、冬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大约到40年代前后，中山装终于普及到了中国社会的基层，并逐渐渗透到边远社区。当时在一般的县城里，大凡公务人员均多穿着中山装。这种情形反映了新兴的国民国家之在建构“国民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深刻地说明了国家机器和制服、礼服